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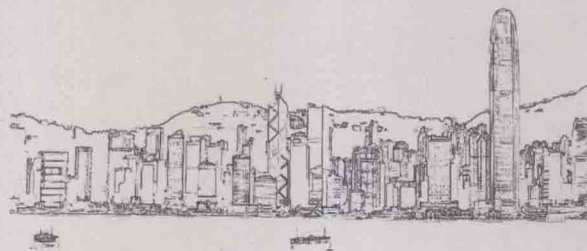
上海市传播学重点学科资助

青年传播学者丛书

马汇莹 著

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 互动、边界与开放

YI GUO LIANG ZHI XIA DE DA ZHONG CHUAN MEI HU DONG BIAN JIE YU KAI FANG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明天文库·青年传播学者丛书

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 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

马汇莹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十年来,这种冲击已经变得更为频繁、直接和有力。事实上,中央政府逐渐改变了部分新闻传播政策,这些改变意味着传媒开放的边界不断被推进。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不是经济越发达,传媒政策就必然会越开放。这取决于当地主管部门的观念,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内地传媒组织与香港传媒的合作已经起步。在新闻观念、管理规则、新闻业务方面内地传媒均明显受到香港传媒的影响,广东电视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由于政策限制,两地传媒真正的竞争还远未开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马汇莹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明天文库·青年传播学者丛书)

ISBN 978-7-313-07268-9

I. 一... II. 马... III. 新闻工作—文化交流—中国—现代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3950 号

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

马汇莹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91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30

ISBN 978-7-313-07268-9/G 定价: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3854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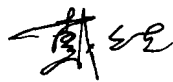
总序

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初入传播学的年轻人,所呈现的成果大部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他们首次交给学界的入门答卷,也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与传播鲜活的案例,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听得见时代的脚步声,可喜可贺!我希望他们继续自己的研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呈现新的成果,以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丰富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不客气地说,这个领域发展得不怎么好;新闻学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经历了三四代人,在新闻史研究、新闻业务研究方面有一批成果,但新闻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比起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差距;传播学研究有30多年的历史,著作有千部之余,论文有数万之巨,但基本上仍停留在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仍然很苍白!

我们当然知道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难度,我们也忘不了中国老一辈新闻传播学者所做的艰苦努力。现在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才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未来。

在这套丛书出版的时候,我写下如此几行文字,权当感言,以求教于大家。



辛卯年初月于上海寓所

前言

同很多人一样,记得最早知道“一国两制”这个词汇应该是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让这个词汇鲜活起来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个晚上,当时的我是一名大一学生,通宵达旦地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兴奋、激动,觉得那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似远似近。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如果不是每年的“七一”庆回归晚会,基本可以确定,在我的脑海中几乎很少再浮现过“一国两制”和种种关于它的联想。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港督失魂落魄地从海上走了,香港回归了,中国人民一雪国耻了,这此后发生了什么、将会发生什么,就像童话里“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还用得着我吗?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从6月份开始,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上铺天盖地堆满了香港的消息,持续了40多天,仿佛要消化掉积存了十年的余粮,又仿佛多年未见面的朋友一朝相见,恨不能一口气讲完这十年的种种际遇。丰富的“新闻大餐”一道道端上来,迫不及待地希望亿万观众、读者吃下去。媒体所报道的香港,似乎像穿了隐身衣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一时沉寂,忽而又极度繁华。不管是沉寂还是繁华,总觉得像有一层绝缘体一样,远远地隔开作为“他者”的香港和“我们”。

香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在于保持香港自身的核心精神、秩序和特色。同时,香港离“我们”也渐行渐近。这也许是几乎所有的内地传媒在报道回归十周年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变”与“不变”作为主题的原因。回归十年,调查显示港人的国家认同感在增强,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集、直接和深入。2003年中央政府推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香港加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至2007年6月29日CEPA已签署第四份补充协议,CEPA对香港开放领域增加至38个,这推动了两地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互补;2003年,大陆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并逐批开放“自由行”城市。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十年来,内地赴港旅游者增长6倍,从1996年底231万人次增长到2006年底1433万人次;2005年7月北京奥组委宣布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将在香港举办;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把香港纳入其中。此外,大陆允许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香港施行“内地优才入港计划”,这一系列措施使得两地的合作扩至包括环保、教育、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福利在内的多个领域。

的确,“一国两制”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宏大的、政治性较强的叙事结构,却也容

易让我们忽略掉两地交往中,那些生动的联系、细节、变动,以及疑问、困惑与内涵。在不可更改的政治安排背后,融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脉动和回声,是如何将内地与香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大众传媒是信息流动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两地大众传媒是如何互动的,这些互动促使内地传媒系统发生什么变化?如果以此为线索,这十年里又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本书关注的是香港回归十年以来两地大众传媒的交流,这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分为报纸、电视、广播,介绍了回归十年后香港大众传媒的现状,并综合分析了这十年来香港整体新闻生态的变化。第三章从政府规治的角度比较了两地传媒体制的重要差异。法律条文、管理规定划出了传媒活动的刚性边界;此外,两地传媒还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新闻理念和职业规则,认清这些差异是分析两地传媒交流的前提与基础,有助于理解交流中出现的碰撞、冲击甚至矛盾。第四章分析了新闻传播重要政策的变化及背景,探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上有哪些措施,并从传媒组织与实践层面讨论内地传媒如何应对香港因素;同时,还回顾、分析了海内外媒体对香港回归十周年各具特色的报道。第五章探讨了一国两制下的凤凰卫视对于两地新闻交流的独特意义。第六章考察香港电视在广东的跨境播出,并进行了受众接受分析。最后在结语部分回顾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传媒组织对香港因素的不同应对,总结了内地传媒开放的动力机制。

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研究,是跨境传播的一个新领域;回归十年还只是一段历史进程的开始,许多情况处于变化之中,在一些议题上也颇具争议。本研究尝试着抛砖引玉,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两地传媒系统的互动和变化。

目 录

第一章 一国两制：跨境传播的新领域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8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28
第二章 香港传媒：后回归时代——香港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状	31
第一节 传统报纸与免费日报	32
第二节 电视：多元化发展	40
第三节 电台：风波不断	51
第四节 回归后香港传媒的整体生态	55
第三章 两地传媒体制比较	62
第一节 香港的大众传媒管理	62
第二节 内地的大众传媒管理	67
第三节 两地大众传媒比较：体制与观念	75
第四章 两地大众传媒互动：直面香港	85
第一节 十年新闻交流历程回顾	85
第二节 新闻传播政策：嬗变与突破	93
第三节 传媒业务：借鉴与创新	102
第四节 海内外媒体的香港回归十周年报道	121

第五章 “一国两制”与凤凰卫视	130
第一节 凤凰起飞	130
第二节 凤凰冲击波	137
第三节 凤凰台与中央电视台:局部竞争	152
第六章 香港电视在广东:跨越边界的传播	161
第一节 “第一梯队”的香港电视	164
第二节 “鲶鱼效应”与广东电视	171
第三节 观众的选择:悄无声息的变化	187
结语	204
附录一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新闻文化交流大事记	211
附录二 港澳新闻机构在内地设立常驻记者站及派遣常驻记者须知	220
附录三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港澳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	224
附录四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	226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9

第一章

一国两制：跨境传播的新领域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研究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是跨境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其要点是跨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大众传媒系统如何应对对方冲击。本章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继而综述了内地学者与港台、海外学者的不同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传媒组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最后介绍了研究方法。

第一节 研究缘起

香港虽然面积小，但对内地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学者金耀基在《香港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一文中曾经这样分析，“香港真正的意义，对于华人世界，特别是对内地的华人社会来说，不是它狭义的经济影响，而是它在现代化道路上所累积的具有示范性的成就，香港所建立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现代文明社会。在香港，中国文化依然存在，但已转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在这里交光互影，已经出现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新秩序，但却与中国的传统不能分割。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现代文明社会，它对华人世界，特别是内地的华人社会，才真正显示它的意义与价值。”在经济领域，香港被称为是全国经济、贸易、金融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水龙头”。在文化领域，它是内地向外看的一扇窗，是连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一座桥，也是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交光互影的一个舞台。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安排，使它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实验室”，无论是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还是国家统一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研究目的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两地传媒系统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多。整体

而言，香港是一个较为开放、自由的社会，政府对传媒的直接管控较少，而内地社会相对较为封闭，传媒一向被视为党的“耳目喉舌”，这两种来自不同社会、不同传统、性质不同的传媒系统不可避免地碰撞到了一起，无论是中央政府、各地地方政府还是传媒组织与从业者，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由此带来的冲击。那么，回归的第一个十年，香港与内地的大众传媒开展了哪些交流，又经历了哪些变化？香港回归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意涵，而对两地的传媒系统来说，“一国两制”带来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互动过程是双向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两地传媒系统都面临着如何应对对方冲击的问题，但是本书的视角主要落在内地政府与传媒系统的应对与变化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香港流行文化就风靡内地。回归之后，内地对境外传媒管控依然较为严格，但伴随着内地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在变化，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策，在应对境外传媒上都有了新举动和新观念；从传媒组织层面来讲，尽管香港的传媒并不能直接到达内地受众，但两地的传媒组织、从业人员之间来往频繁，部分香港传媒及其内容、产品也通过种种方式正在进入内地市场，这些都冲击和改变着内地的传媒生态和新闻文化。

本书想集中探讨的是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如何应对由直接交往而带来的张力？这种应对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传媒组织三个层面，通过审视这些不同的参与者如何进行交流、协商与妥协，来探讨新闻文化交流中原有边界的渐进式变化，希望描绘出这种动态的过程。

二、研究意义

内地传媒系统如何直面香港因素，这本身是内地传媒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入世，对外开放与交流是大势所趋。香港与内地可以视为同一个民族中的两个不同系统，直接交往带来了一定的张力和压力，在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下，两者之间的这种碰撞与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借以观察内地传媒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原有的各种边界在外来因素下如何改变或修正，各种动力以及内外因素又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这个进程。

从理论上来看，这个议题属于跨境传播(trans-border communication)研究，香港回归对于跨境传播研究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以前的跨境传播一般是指跨越国界的传播，起源于一战、二战中的宣传研究。跨境传播研究大致沿着两条脉络在进行：一条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视野下，偏重于宏观分析，通过分析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与结构，认为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造成潜在威胁；另一条是文化研究脉络下，偏重于从受众层面进行效果研究与接收研究。香港回归后，意味着“跨境”是指跨越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边境，但又属于一个主

权国家之内,除了地理上的界限之外,更重要的是“两个制度”即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跨越。这种独特性带来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或管理政策,如凤凰卫视的跨境播出,再如中央政府批准香港电视在广东有线的开路播出等。一方面,通过对这些独特现象的研究,试图为跨境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传播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也具有一个封闭社会怎样走向开放的共性,这是较具普遍理论意义的问题,本书试图从社会开放的动力机制分析这种共性。

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将有利于“一国两制”的贯彻和实施。以媒介系统为中心,深入观察香港社会和两地的交流与碰撞,这有助于深入了解香港社会、文化和传媒运行,掌握两地交流的潮流和趋势,有助于制定对香港政策以及内地对香港报道的传媒政策。尤其是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中怎样应对香港和内地两个异质的社会系统间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文化不同带来的张力,有利于“一国两制”制度的完善。在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也有助于理解一个社会系统怎样更好地处理对外交往过程中的碰撞和张力、怎样和谐地共存和发展。

为什么选择十年这个时间截点?借用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的一段话作答,“回归已有十年,是做出阶段性总结的时候。所谓十年总结,只是一种从俗的纪念性说法。不过,过往十年,香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像坐过山车,经历着高低起伏,现在才稳定下来,开始抬头展望未来。从历史阶段性来说,这也是检阅实验进展的时候。”^①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许它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起点、开端,但对社会科学来说,记录、关注这个变化的过程,感知它哪怕是细微的裂变、重组与更新,有助于理解社会的变迁过程。

三、理论框架与概念剖析

1.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是本书分析两地传媒交流的一个重要背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后被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香港回归后,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大约15年前,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归中国后,‘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②在1980年代,一国两制被理解为“河水不犯井水”,即内地的社会主义不影响香港的资本主义,同时也防止香港的资本主义影响内地。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香港回归以来,随着

^① 陈韬文,黄煜,马杰伟,萧小穗,冯应谦. 追寻香港个案的理论意义[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7(3):1-4.

^② 张铁钢.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香港回归百日记[J]. 了望,1997(40):44.

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的实践,一国两制被纳入更高、更远的战略考虑,“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把国家统一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放到一起来考虑,让国家统一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互相促进,让统一能够一箭双雕,既实现了中华民族希望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同时也利用统一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大地往前推动”^①。

一国两制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是基于香港与内地两地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一方面,香港在多个方面对内地有引领、示范的作用。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香港是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是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桥梁;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体系。“在过去近30年里,香港累计向内地投资达2700多亿美元,比内地吸收来自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总额还要多,这些投资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②近年来,无论是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还是应对突发事件、改善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等多个方面,都可看到内地从香港学习到的经验。另一方面,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内地腹地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同时面临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在高新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竞争,面临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挑战。内地持续的经济增长势头、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入世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这些都可以转化为香港的新优势和增长点。总之,“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是在一国的共同利益下如何发挥两制不同的好处,为国家服务。”^③一国两制被理解为一种将使香港和内地都从中受益的政治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回归十多年来,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集、直接和深入。2003年中央政府相继推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2005年7月北京奥组委宣布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将在香港举办;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把香港纳入其中。在“一国”的共同利益下,“两制并存”也意味着差异、冲突和矛盾。回归以来“两制”在一些领域或环节的衔接上也曾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如在法律层面的居港权争议、婚姻法冲突、全国人大三次释法、《基本法》23条争议等,在应对SARS、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安全危机等方面两地措施的磨合;再如关于香港人“爱国”与“爱港”、香港本土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争论,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国两制条件下人民内部的矛盾”^④。

① 王振民. 一国两制的新发展[J]. 了望,2007(43):90-91.

② 同上.

③ 温家宝总理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的讲话.

④ 李超. 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国两制”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3.

也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从1997年起,中国在国家制度,价值观,社会结构及经济体制方面,便从一个一元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二元化国家,有别于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基本上实行‘大一统’政策的做法。”^①

2. 大众传媒

在频繁的人员、物资、资金流动的背后,信息、观念、思想意识、价值观等无形的事物也在交流互动。后者可以视为促进前者流动的“润滑剂”。大众传媒正是承载着这些无形事物的重要载体或通道,在现代社会中更是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回归后,两地交往的增多既投射在新闻传媒领域,也带动着两地传媒系统的交往。

两地的大众传媒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传媒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政府与传媒的关系、传媒产业的运行、新闻观念等多方面来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详细分析参见本书第二章)。简言之,内地新闻传媒被视为党的“耳目喉舌”,在重大新闻与重要人员的任命上接受党的直接领导;近年来,随着传媒的市场化进程,人们也渐渐认同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即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政府对传媒业的改革也实行了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分类管理的办法。在香港,媒介归私人所有,从业者一般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原则;在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传媒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近十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香港传媒出现“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②现象,一些媒介在逐利动机下,把政治、立场当商品以刺激销量;信息琐碎化、煽情化,主动迎合部分受众的低俗趣味。

本书所指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媒体,部分内容也涉及杂志和互联网、数字电视等媒体。对大众传媒系统的分析偏重于中微观层面,主要包括:

(1) 政府对传媒的管理规则,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新闻传播政策、如何应对境外传媒等。

(2) 传媒组织的实践,如传媒的传播观念与内容生产、传媒组织的运行规则、经营管理等。

(3) 传媒从业者的行为与观念。

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很难截然分开,为了论述的清楚,将其分为这三个方面。在部分篇章里也涉及受众分析。之所以将重心放在传媒系统的管理者与传者部分,

^① 刘兆佳. 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意义[EB/OL]. 中国台湾网, <http://2006.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1165/Uadmin/A2105751.html>, 2008-3-12.

^② 苏钥机. 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G]//陈韬文,朱立,潘忠党. 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 香港:炉峰学会,1997:15-23.

是因为内地对包括港资媒体在内的外资传媒的进入还有种种限制，在受众层面还较难直接感受到这种冲击和变化。随着两地传媒交流的深入，以后的研究者或许会逐步关注更多的层面。

3. 互动

回归后，香港因素与内地因素分别对两地传媒系统带来不同的影响，两地也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应对措施。

对于香港方面来说，政权结构的变化是传媒及整个社会面对的最的“政治”。无论是香港政府、社会组织与个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历这种深刻的转折和变化。而对于幅员辽阔的内地来说，香港只是一个面积有限、人口有限的特别行政区、一个南中国的城市，其冲击相对来说较为有限。再加上香港回归后，因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等一系列冲击，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低迷，而同一时期内地则迎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逐渐恢复文化上的自信，香港的文化引领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特别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种冲击还受到政策壁垒的阻隔。至今为止，内地仍然严格控制香港报纸、香港电视在内地的发行与“落地”，这直接削弱了香港因素对内地社会及内地传媒的冲击力。

尽管如此，香港回归仍是影响中国传媒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从文化体制改革的高度需要及时应对境外传媒的冲击；随着外媒记者进入内地采访的政策放宽，一些社会事件影响力会迅速从“国内事件”演化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将不得不直面国际舆论。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两地记者将会更多地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或现场，展开同场竞争与合作，无论是在传媒组织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两地不同的新闻观念、新闻范式、操作手法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本书将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上。希望与香港研究者所研究的香港传媒如何应对内地因素形成一种呼应（详见下节文献回顾部分）。

4. 边界(boundary)

“边界(boundary)，首先意味着差异(difference)、区隔(distinction)或界限(border)。具体说，边界，是人和物的限度或边缘的界线，是自身与他人或他物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但区分和差异背后，预设人的认知活动，尤其是分类或范畴化过程；并且，这种区分结果是社会共识性的，而不是私人性的。”^①按照有形与无形，边界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有形的、现实中存在的，如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另一种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是概念性的、想象性的，如社会学意义上用于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符号边界”。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边界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过程。以社会学语

^① 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5(1): 32-33.

境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符号边界”为例,“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者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这种社会分类通过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①

本书所指的“边界”,既指香港与内地在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更偏重于区分内地、香港两地不同传媒系统的“符号边界”。这种边界的形成既有制度性因素,如制度安排、法规条文,也有观念性因素,如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职业规范、新闻理念等。随着两地频繁的社会互动,无论是以新闻传播法规条文、政府政策形式出现的制度边界,还是传媒组织和从业者的观念和行为习惯,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并不断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

5. 开放

如果新闻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新闻自由的话,那么,“开放”可能是我们现阶段或者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关注的关键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版的解释,与本书研究相关的词意是“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近几年来,对中国“开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如果把一个社会整体视为一个系统的话,从逻辑上讲,“开放”必然包含“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更是因为,从开放社会的本质特征上看,对内开放,才是一个社会足称‘开放’的秩序基础和价值核心”^②。

主动与被动。一般认为,30年前的内地改革开放是在经济、社会处于不佳状况下作出的被动举措;迈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背景下,随着中国人世、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被吸纳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都必须坚持开放。

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常用的“对外开放”一词,一般指经济领域,“如果单纯讲企业开放、讲经济开放,则没有可持续性。现在我们所处的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讯全球化带来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拐点’。面对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在队伍建设、信息网络储备、年轻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已具有一定基础,但还需要在软实力方面有长足的发展”^③。由此可见,“开放”不仅指经济领域,随着中

^① 潘泽泉.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流动农民工为例[J]. 社会, 2007(4): 48-67.

^② 张贵峰. 还有多少未竟的“对内开放”[N]. 解放日报, 2005-11(24): 6.

^③ 方栓喜. 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进对外开放[N]. 光明日报, 2007-6(19): 2.

国社会转型,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文明领域。

本书所分析的“开放”即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香港对于内地来说是促进开放的外部因素之一,这个独特的外部因素如何与内地社会及传媒自身的改革进程一起发挥作用,内外因素如何互动,推动传媒获得更多的话语空间和更大的自主权,这是本书讨论的主旨。当然,对这个过程的考察无法割裂“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文献回顾

如上文所述,本书要研究的重点是回归后,内地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传媒组织应对的措施是什么,带来了哪些变化、影响或者引发了何种连锁反应。针对这个目标,本节所分析的文献包括书籍、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与期刊等。直接研究回归后两地传媒互动或交流的文献很少。内地的研究整体上比较偏重于对香港传媒的介绍,香港的研究则比较偏重香港传媒自身的变化。国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一、内地学者的研究

书籍方面总的来说比较少。1997年,学者陈昌凤推出专著《香港报业纵横》,是关于香港当代报业历史的一部力作。2002年,学者钟大年主编了《香港内地传媒比较》一书,从整体概况、属性与功能、传媒管理机制、传媒法规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比较。书中写道,“内地与香港传播媒介的比较,是一个复杂的题目,其复杂性就在于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不仅有着各自隔绝已久的发展源流与系统,而且它们各自又是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相互靠拢与汇聚。在这个靠拢与汇聚过程中,影响与排斥、主动与被动、吸引与抗拒、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①这也是较早注意到一国两制下的新闻传媒如何互动这个研究主题的著作之一。除了学者们的著述外,两地新闻采编工作者也有一些著作,偏重于工作观感与采编经验比较,如:斯雄的《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吴江的《旅港时评》等。回归十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根据拍摄的专题节目整理成书《CCTV 香港十年》,曹景行《香港十年》,还有《一国两制的文化交流》等书。

学位论文方面。复旦大学谷雨2006年提交了硕士论文《新闻工作者的异类——“狗仔队”现象分析及反思》,其中对香港传媒“狗仔队”现象作了研究和反思,认为“狗仔队”虽然满足了部分公众的好奇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给

^① 钟大年. 香港内地传媒比较[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9:1.

部分通俗报刊带来了高额利润,但是他们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广大和深远,如侵犯了名人们的隐私权,破坏了传媒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对于“狗仔队”应采取法律手段来制止其恶劣违法的行为,从长远而言,更应该倡导媒体和公众伦理道德的回归。林群探讨了《在竞争中腾飞——凤凰卫视的品牌塑造》,还有两篇分析香港电影的硕士论文。暨南大学也有多篇硕博论文研究香港传媒:陈曦的硕士论文《论香港电台的角色及定位》,作者作为香港电台的一名工作人员,将视线集中于电台的角色冲突和功能定位:香港电台是香港唯一的公营广播机构,既要遵守政府部门的程序规范,又具有一般传媒的特性,拥有独立的编辑自主权与其他的媒体竞争;既要为大众服务又要兼顾小众兴趣,不用靠广告收益来作为节目的取向但又很在乎节目的收听及收视率;经费来源于政府却须力避市民当它是政府的传声筒或喉舌。文章认为香港电台既要服务市民、宣传政府政策也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舆论功能。周道宁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内地和香港电视广告形象比较研究》和刘刚的硕士论文《粤港电视新闻传播文化分析》,都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香港和内地的传媒文化。李广丰的《香港〈太阳报〉新闻采访与报道研究》侧重香港传媒的新闻业务研究。陈世光的博士论文《香港大众传播产业研究》,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介绍了香港大众传播产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论证了这些结构和组织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的演变及其特征,并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香港大众传播产业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庄雨亭的 MBA 硕士论文《三个成功的香港传媒“走出去”案例——给国内传媒业改革作参考》,分别分析了三家企业: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TOM 集团有限公司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如何开展国际业务,这些企业有很高的国际化程度、在资本运作和公司策略上有其特点与启发性,希望对国内传媒“走出去”有所启示。

以下将着重分析五种内地主要学术期刊从 1996 年至 2006 年的相关文献。这五种期刊是:《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现代传播》(双月刊)、《新闻大学》(季刊)、《国际新闻界》(月刊)、《新闻记者》(月刊)。其中,前三种期刊学术色彩较浓;后两种期刊学界、业界并重,因分别地处北京、上海,研究者与香港交流较多而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这五种期刊基本代表了内地新闻传播界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旨趣,视野开阔、内容丰富。

在这 103 条文献中,通过对体裁的分类发现较为正式的研究论文有 78 条,其余为:简讯 11 条,会议综述 8 条,演讲稿、随笔 3 条,其他 3 条。

从表 1.1 可以看到,以时间轴来观察,内地对香港新闻传播的关注兴盛于九七回归,以后趋于平稳。从 1996 年开始,已经有研究者在关注香港的新闻传播,1997、1998、1999 连续三年发表的有关文章都数目较多,以后则数量减少。这显示“回归”效应对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在 1997 年的 25 篇文献中,历史(6 篇)、回归